
性别视角下的“慰安妇”问题

胡 澎*

内容提要:“慰安妇”问题的实质是日本政府及其军队有组织地实施了性暴力,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在研究“慰安妇”问题上,性别是继历史、政治、国际关系、国际法等视角之外的一个新的也是重要的切入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的女性研究者、女性社会活动家和民间妇女团体跨越国境对“慰安妇”幸存者的调查、采访以及由女性主导的“关于妇女的国际战犯法庭”活动,使得“慰安妇”问题在性别意义上超越了国家主义的藩篱,成为一个东亚和世界的问题。本文是从性别视角对“慰安妇”问题的探索性思考。

关键词: 慰安妇 性别视角 战争犯罪 历史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日军铁蹄之下普遍设置了与日军相关联的“慰安所”^①,随之产生的“慰安妇制度”是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在这一制度的奴役下,数十万中国、朝鲜、东南亚和欧美国家的妇女惨遭日军蹂躏。在二战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慰安妇”一直是一个被遗忘的群体。直到1991年,韩国的金学顺第一个勇敢地站了出来,证明自己就是被日军强征的“慰安妇”,并与其他两名“慰安妇”幸存者以及原军人、军属和遗族等32人组成控诉团,向东京地方法院状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承认战争罪行、给予赔偿和谢罪。沉默了46年之久的“慰安妇”问题终于重新浮出了历史地平线。此后,韩国、中国、东南亚诸国从前被迫做过“慰安妇”的妇女相继公开自己的姓名,并纷纷出来作证,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此后,“慰安妇”问题在日本、东亚乃至世界范围成为一个新的话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① 慰安所的设置据称是为了防止日本军人在战地实施强奸等不法行为以及性病蔓延导致战斗力下降,然而实际上未能阻止或减少日军铁蹄所到之处的性暴力。

题，并由此而引出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件。

一 从性别视角^①研究“慰安妇”问题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慰安妇”问题在日本、东亚乃至国际社会的一次次被提及，“慰安妇”已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对“慰安妇”问题的认识、表述和研究涉及了政治、历史、文化、人权、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并与战争、民族、国家、性别等概念纠缠在一起，呈现出纷繁万象。如今，“慰安妇”问题所涵盖的意义已远远超过了“慰安妇”事件本身。

归根结底，“慰安妇”问题的实质是日军对中国、朝鲜、东南亚及少数欧美国家妇女实施了性暴力。因此，“慰安妇”问题自诞生的那一刻就已经与性别扯上了关系。同时，“慰安妇”问题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也与性别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88年韩国教会妇女联合会的尹贞玉等人开始了“慰安妇”调查，并在联合会里设立了“挺身队研究委员会”。1989年1月“韩国妇女团体联合会”发表了反对韩国派遣使节参加昭和天皇葬礼的声明，在声明中提到了挺身队问题并要求日本政府谢罪。针对韩国妇女团体的要求，日本国会进行审议，但审议结果否认了“慰安妇”与军队和国家之间的关联，一些日本政要也发言称“慰安妇”是“卖淫”，强调“慰安妇”并非强征而是一种商业行为。日本政府和政要这些回避责任的发言，激起韩国妇女和妇女团体更大的愤怒，“韩国妇女团体联合会”等37家妇女团体向日本国会递交了抗议信，并组成“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负责调查、研究和取证日军对朝鲜妇女的性暴力活动。正是在韩国妇女运动的鼓舞和直接影响下，1991年作为受害者的“慰安妇”幸存者终于打破了沉默，针对把“慰安妇”说成是“卖淫”这一歪曲事实的谬论，勇敢地说“不”，并将日本政府推上了被告席。可以说，“慰安妇”幸存者的勇敢行为，既

^① 性别（Gender，也称社会性别）指男女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两性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习惯。性别视角指从性别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问题。

是受韩国妇女运动的激励，又反过来为包括“慰安妇”问题在内的整个东亚社会妇女问题的研究注入了活力。

当我们用性别视角考察“慰安妇”问题的时候，就不难发现：“慰安妇”在二战结束后长达半个世纪的集体“失声”、日本政治家和右翼势力对“慰安妇”问题的否认、歪曲乃至人身攻击，其中都蕴涵着一种深刻的性别歧视意识。直至 21 世纪的今天，这种性别歧视意识依旧潜伏于日本社会意识的底层，并影响着一些日本政治家和右翼人士的历史认知。

以性别视角分析“慰安妇”问题还有一个更为有利的条件，就是日本学术界从性别视角研究近代史起步比较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随着“日本女性学会”、“日本女性学研究会”等多个女性学研究团体的成立，文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领域的许多学者开始在研究中引进女性学的理论。像加纳实纪代、上野千鹤子、铃木裕子等女性学学者，分别从性别视角反思近代以来日本女性史，挖掘二战期间日本妇女支持战争的史实并追究日本妇女所应承担的战争责任。1991 年“慰安妇”幸存者的指证使得一些有良知的日本学者开始关注“慰安妇”问题。日本的一些妇女团体、女性学学者、社会活动家，本着对历史负责、对“慰安妇”幸存者负责的态度，从性别的视角介入历史，反思包括“慰安妇”问题在内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由女性学学者、妇女社会活动家、妇女团体所构成的女性主义阵营，成为研究、调查和解决“慰安妇”问题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方，也是抗衡和批判性别歧视意识、狭隘民族主义思潮、历史修正主义、自由主义史观的一支重要力量。她们对日本近代女性史的重新梳理和思考、对“慰安妇”幸存者的调查和研究，为我们更进一步地思考和研究“慰安妇”问题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二 “慰安妇”问题中蕴涵的性别歧视意识

为什么“慰安妇”问题被尘封了近半个世纪？为什么在对“慰安妇”问题的叙述、认知以及解决途径上各派观点众说纷纭甚至尖锐对立？一些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蕴涵于东亚文化中的性别歧视意识是根

源之一。众所周知，东亚漫长的父权制制造了女性的从属地位以及男女性别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同时也构筑了这一性别歧视意识。女性作为男性的私有财产被限定在家庭领域，并在公共领域常常处于“失明”、“失聪”和“失语”的地位。

追根溯源，“慰安妇”制度并不是二战时期日军的“发明”，而是一直植根于漫长日本历史中的一个“传统”。早在16世纪后半期，丰臣秀吉在大阪、京都就专门辟有游廓（妓院区），由幕府进行管理。游廓里的妓女、艺妓是没有人身自由的性奴隶。这一政府通过政治权力对卖淫进行“公”的管理的制度被称为公娼制。明治维新后，随着日本在海外殖民地的扩张，日本的娼妓业开始在东南亚地区扎根，之后在台湾、“满洲”、朝鲜半岛等地遍地开花。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盟军总部下达了关于废止日本公娼的备忘录，但公娼制并未真正被取缔。日本当局为了减少占领军强奸日本妇女案件的发生，依然延续了公娼制的思维和做法，设立了特殊慰安设施协会（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 RAA）这一场所，公开招募妇女对占领军从事性服务，并美其名曰此举是为了保障良家妇女的安全而设立的一道“防波堤”。因此，日本的公娼制实质上是一种国家权利对女性个体的性侵害政策，而二战时期日军的“慰安妇”制度不过是对女性的性侵害政策在被侵略土地上的延续和扩展。

当公娼制以及父权家长制下对女性的歧视和压抑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慰安妇”问题的实质便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这也成为导致战后以来“慰安妇”问题一直被认为是军队内部的问题而被合法化的原因之一。作为加害者的原日本军人往往不认为自己的行为在实施公娼制的战争期间是一种犯罪，缺少良心上的反省和自我谴责。也有不少人将“慰安所”、“慰安妇”看成是战争的产物，是避免不了的，认为“战争时期，尽管她们很可怜，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些右翼分子或政治家不但极力否认“慰安妇”历史的真实性，甚至对那些勇敢站出来指证的“慰安妇”幸存者进行肆意诋毁和羞辱，说什么“既然有那样一种经历，就应该感到耻辱而保持沉默”。

另一方面，在东亚传统的性别观念影响下，受害妇女往往认为自己被迫做过“慰安妇”的经历是自己一生的耻辱，而其周围的人也大都

认同这种耻辱，并把她们的遭遇看做是居住共同体的耻辱。这种“耻”的思维，使她们在二战后依然长期生活在自卑的阴影中，命运十分悲惨。

三 介入女性史、性别史的“慰安妇”问题

日本的一些女性史学者认为，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慰安妇”问题无疑是一个历史问题。同时，它又因蕴涵着性别因素而在研究中被归属到了女性史、性别史的范畴。因此，“慰安妇”问题不仅关系到如何客观对待历史、将历史的真实告诉后代的问题，还关系到如何以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历史、还原历史，并如何在东亚共同记忆和共同历史认知的基础上书写和建构东亚女性史、性别史的问题。

女性史、性别史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性别”是作为与“种族”、“阶级”同样重要的视角而被引入的。当性别没有被作为一种视角或是一种方法引入时，在历史叙述中它一直让位于公共领域、国家概念等理论。这就造成了女性对长达 15 年侵略战争的历史叙述的缺乏。同时，在以往描述“慰安妇”历史的话语中，作为历史主体的“慰安妇”也是“失语”的。这种“缺席”和“失语”，必然导致“慰安妇”历史的不完全和不客观。

“慰安妇”问题被纳入女性史、性别史的最重要意义之一，在于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历史主体——“慰安妇”的登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日韩的女性研究者、妇女团体对“慰安妇”幸存者进行了大量的采访、调查和研究。她们通过对“慰安妇”个体记忆的记录、整理和分析，寻求“慰安妇”受害的整体记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慰安妇”在历史叙述中的缺席。

由于日军在战败的最后时刻，将大量重要文件和资料进行了销毁，其中有不少是证明政府、军队与“慰安所”设置之间关系的重要资料。因此，日本社会滋生出了诸如力图隐蔽和抹杀“慰安妇”历史存在、为侵略战争寻找合理依据的“历史修正主义”史观、自由主义史观、侵略史观以及将历史的细节、官方资料作为唯一证明史实存在依据的史料至上主义等多种历史观。这些都使得对“慰安妇”问题的探讨、研

究和争论时而陷于政治立场和主张的旋涡之中，时而又陷入一种文书至上、“一叶障目”的境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慰安妇”幸存者的调查、采访、录音、整理、分析的口述史方法就显得弥足珍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一些妇女团体以及日本律师联合会等非政府组织，在“慰安妇”问题上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做着还原历史的工作^①。她们不仅仅将目光停留在“慰安所”的“慰安妇”身上，还把目光转到在战场遭受日军性暴力的普通妇女身上。例如，“揭示山西省实情会”、“从性暴力的视角看日中战争的历史性格研究会”以及“查明日军在中国的性暴力实情、支援索赔诉讼会”，从1996年到2004年期间，对日军在山西省孟县实施性暴力的情况进行了连续的采访调查。参与调查的不仅有研究人员、律师，还有学生、公司职员、主妇等一般市民。他们通过大量取证、口述记录进行学术研究，还对孟县“慰安妇”幸存者的对日索赔进行了声援。

采访者通过一次次的访谈，消除了“慰安妇”幸存者的恐惧、自卑和羞耻，帮她们找回了做人的尊严，并使她们产生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的勇气。随着对事件的调查、取证，这些受害妇女尘封的记忆闸门被打开。女性研究者们将对当事人的采访以口述史的方式记录下来，并将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如石田米子和内田知行主编《黄土村的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还没有结束》^②、石田米子著《中国农村采访中所见之战时性暴力的结构》^③等研究成果，不仅揭露了日军在孟县性暴力的实情和背景，同时指出孟县的性暴力是不同于“南京型”、“慰安所型”的前线“低端型”性暴力^④，即日本兵将中国妇女强制绑架、监禁在部队据点和设施中加以轮奸，也有的被军官长期占有；对那些离开家其家庭成员便无法生存的妇女则在其家中进行长期的轮奸等。女性研究

① 还原真实的历史需要一种客观的历史态度，既要记录民族的优良传统中的“善与美”，也不遮盖民族历史中的“丑与恶”，尽可能把历史的真实、经验和教训传承给下一代。

② 『黄土の村の性暴力——大娘たちの戦争は終わらない』、創土社、2004年（该书获得山川菊荣优秀妇女问题研究著作奖）。

③ 『中国農村における聞き取りから見た戦時性暴力の構造』、『鳴門史学』18、2005年。

④ 参见小滨正子：《利用口述史料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可能性——以山西孟县日军性暴力研究为例》，《史林》2006年第3期。

者对这些“慰安妇”幸存者的采访，极大地扩展了“慰安妇”历史的研究空间，把那些将“慰安妇”悲惨遭遇污蔑为“卖淫”的谎言还原为“对妇女施加性暴力”的历史，并把日军性暴力的实情、背景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慰安妇”幸存者的个体记忆被挖掘出来并逐渐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同时也成为其所属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慰安妇”问题中的对妇女的侵害问题

（一）作为战争犯罪的“慰安妇”问题

“慰安妇”问题建构在战场上日本军人所作所为基础之上，同时也是建立在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现象的历史认知之上的。日本社会在“慰安妇”问题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历史认知。有人认为，战争是残酷的，战争中发生的对妇女的侵害是不可避免的，没有把这一行为看成是战争犯罪。还有一些人把“慰安妇”问题看做是军队内部的问题，并把它与个人行为、商业活动画上了等号。日本政府也在“慰安妇”问题上表现出少有的暧昧与含糊其辞，尽管有 1993 年的“河野谈话”^①，仍以种种借口加以回避。1995 年 7 月，日本政府为平息亚洲各国对其处理“慰安妇”问题不力的指控和缓解舆论压力而设立了“亚洲妇女和平基金会”（简称亚洲妇女基金^②），但此举只是从道义出发对部分“慰安妇”幸存者进行了赔偿，回避了政府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国际人权机构通过决

^① 1993 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在谈话中承认“慰安所的设置、管理及慰安妇的移送，与旧日本军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招募慰安妇确实是应军队的要求并以业者为主，但存在许多以哄骗、强制等违反本人意愿的事例，并且，宪兵有时也直接参与。政府借此机会，再次向不论出身地的被作为随军慰安妇、有着很多苦痛经历的、有着难以愈合身心伤痛的所有人表示由衷的谢罪和反省”。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这一重要表述被称为“河野谈话”。虽然“河野谈话”现在看来仍不够充分，在谁是导致“慰安妇”问题的主要责任者、日本军队和商业经营者两者谁应负主要责任上有些暧昧，隐藏了问题的实质，但“河野谈话”承认了“慰安妇”问题是重大的侵害人权事件，具有不容低估的意义。

^② 该基金由日本内阁府（原总理府）和外务省共同管理。政府全额负担基金的运营经费，并对募集资金活动进行全方位的支持。对于这种试图用金钱赔偿来了结问题的权宜之计，韩国的原“慰安妇”和挺身队协会等 43 家团体发表了反对声明，大多数受害者拒绝领取慰问金，舆论也对基金采取批评态度。2007 年 3 月该基金宣布解散。

议,认为“慰安妇”问题是军队实施的集体侵害,是一种战争犯罪,要求日本政府承担不容推卸的国家责任。1999年8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做出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向二次大战中的“慰安妇”做出赔偿,并斥责日本政府拒绝赔偿的法律依据不足,同时要求各国政府须对本国士兵在战争中的罪行和其他违反人权的行为负责,对其军队的暴行做出赔偿。国际社会不断召开的要求日本政府正式谢罪和进行赔偿的集会以及专题讨论会,都促进着“慰安妇”问题的解决。

(二) 作为对妇女的侵害问题的“慰安妇”问题

日军对妇女的侵害是对妇女的一种深刻的歧视,它既是使妇女屈从的一种手段,又是实行性别统治制度及意识形态的工具。二战后,世界人权会议、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宣传了男女平等权利和人的尊严,特别是《世界人权宣言》、《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一系列文件,普及了人权意识。1993年世界人权会议上通过的《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的宣言》,首次明确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词系“指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通过的《行动纲领》重申了上述原则,并详细而明确地指出特定暴力形式包括武装冲突情况下侵犯妇女的人权,尤其是谋杀、蓄意强奸、性奴役等。会上,“妇女的权利是人权”被作为口号加以普及。这些国际活动将二战期间作为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慰安妇”问题与妇女的人权问题联系在一起,使“慰安妇”问题由历史问题上升到了人权问题。

“慰安妇”问题是日本国家和军队对妇女的人格、人性、民族荣誉和民族自尊心的极大侵害,是强势民族的男子对弱势民族的妇女所进行的集体奴役,是对妇女人权的侵犯。把“慰安妇”问题提升到人权的高度,是向一种传统思维的挑战。从“受害者之耻”到“加害者之性犯罪”也是重新审视历史、转变性别权利关系的过程。因此,“慰安妇”幸存者要求谢罪、要求对她们个人予以赔偿其实是在恢复妇女的尊严。

20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社会已形成和积蓄了一股正视历史、积

极谋求解决历史问题的和平、正义的力量，女性学研究者、妇女活动家和民间妇女团体在揭示“慰安妇”历史的真实性、追究“慰安妇”制度的责任与要求谢罪和赔偿的运动中走到了一起。她们采取了积极行动，为推动“慰安妇”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贡献。其中，成立于 1998 年的“战争与对妇女的暴力日本网络”（VAWW - NET Japan）是最积极、最具斗争性的一股力量。该组织是以 1997 年秋季在东京召开的“战争与对妇女的暴力国际会议”为契机而成立的，旨在对过去乃至当今的战时性暴力采取跨越国境的联合行动。她们所关注的战时性暴力包括二战中的“慰安妇”问题、生活在冲绳等美军基地附近妇女遭受的性暴力问题以及世界范围内武力纷争下对妇女的暴力问题。2000 年 12 月，该组织负责人松井やより^①经过四年的筹备，联合数家世界民间组织，在东京的九段会馆以模拟法庭形式召开了“关于妇女的国际战犯法庭”来审判日军战时的性奴隶制度。参加会议的人数多达 5000 人。“法庭”上，来自朝鲜、韩国、中国、中国台湾、菲律宾、印尼、东帝汶、荷兰等八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80 名“慰安妇”或日军性奴役的受害者，以亲身经历控诉了日军对她们的迫害，对日军犯下的罪行进行了愤怒声讨。该法庭由世界国际法权威法官宣读了判决书，判定裕仁天皇以及九名军部、政府领导人犯有反人类罪，判定日本政府违反国际法，应对性暴力的受害人进行赔偿。

“关于妇女的国际战犯法庭”是以妇女为主导的国际民间法庭，它明确了被称为“慰安妇”制度的日军性奴隶制度是对妇女的战争犯罪，认定日本政府负有法律责任。2001 年 12 月，“关于妇女的国际战犯法庭”在荷兰海牙再次以模拟法庭的形式开庭。“关于妇女的国际战犯法庭”的召开意义重大。首先，它的召开与国际社会采取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捍卫妇女人权的目标是一致的。对受害人的谢罪与赔偿，对加害者的处罚，是为了防止历史的重演。其次，也杜绝了对战时及武力纷争状况下的性暴力不追究法律责任的恶性循环，为确立妇女人权做出了

^① 松井やより曾是《朝日新闻》记者，退休后发起成立亚洲妇女资料中心，后又发起成立“战争与对妇女的暴力日本网络”。在她被诊断患晚期癌症的时候，还捐出了自己的财产作为成立“慰安妇”资料馆的原始资金。《纽约时报》称她是维护“亚洲妇女权利的斗士”，“将被永远怀念，永不会被忘记”。

贡献。

日本的女性研究者、社会活动家以及“法庭”的发起和运营者们在法庭结束之后，开始筹备如何将法庭记录以及“慰安妇”问题传给后代，让“慰安妇”的历史不再重演。2002年，松井提议建立一个资料馆，将“关于妇女的国际战犯法庭”所搜集到的资料以及1991年后历次“慰安妇”诉讼中积累的文件、照片、视频资料都保存下来，从而使这一正义的事业发扬光大。在日本战败60周年的2005年，“妇女战争与和平资料馆”^①正式开馆。该资料馆坚持以下五个基本理念：一是以性别正义的视角聚焦于战时性暴力；二是收集、整理和展示每一位受害人的资料并明确加害责任；三是成为实现未来和平与非暴力的活动中心；四是发起民众运动实现和平与非暴力；五是推进跨国联合活动。资料馆展示的大量历史图片和受害人的血泪控诉，有力地驳斥了一些政治家和右翼分子否认历史的谎言，把真实告诉给民众，宣传了和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目前，该资料馆已经成为研究“慰安妇”问题的一个重要阵地。

五 “慰安妇”问题中的性别、民族与国家

作为男子的日军施暴者对被侵略国家妇女所实施的性暴力，不仅构成了单纯的性别意义上强者一方对弱者一方的侵犯，即一个男性军人对一个普通妇女这样的一组权力关系，同时，它还涉及一个侵略民族与一个被侵略民族之间的权力关系。由此，“慰安妇”问题便介入了民族主义和国家话语，呈现出性别与民族主义狭路相逢的一种局面。

女性主义认为妇女的实际处境是不能脱离民族或国家的语境的。克内则威克（Djurđja Knezevic）在《情感的民族主义》中指出：“强暴是对国家进行羞辱和污染的策略。很清楚，国家是一个女人的身体，或者说它就是一个女人。”陈顺馨等人也撰文强调：“女性的身体在民族战争中其实是战场的一部分，侵犯民族主权或自主性与强暴女体之间、占

^① 西野瑠美子是这家资料馆的负责人之一，而且是“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实现战争被害调查会法市民会议”、“支援中国人‘慰安妇’诉讼会”等多家民间组织的成员。

领土地与‘占领’妇女子宫之间，似乎可以画上一个等号。换句话说，入侵者强行对‘他者’领土的‘进入’(penetration)可以理解作为一种‘阳具’霸权行为。”^①日军对“慰安妇”实施的性压迫、性剥削是民族或国家意义上的。作为男性施暴者的日本军人通过对“慰安妇”、对被占领地妇女身体的占领和蹂躏达到对一个民族的凌驾和压迫。日本军人对“慰安妇”的蹂躏，彰显了强势民族对弱小民族侵犯和占有的权力，表现出日本军人对本民族的自傲和对其他民族的蔑视。

在固有传统思维下，“慰安妇”的女性身份注定了其被他民族男子凌辱而造成的耻辱，已经不仅仅是她自身的耻辱，还是她所属国家和民族所有男子的耻辱，甚至是她所属国家和民族的耻辱。这里，“慰安妇”、被占领地妇女的身体成了这个民族耻辱与灾难的载体。因此，“慰安妇”在身体和精神上所遭受的是性别、民族、国家的双重迫害。

女性不仅不能脱离民族、国家的语境，其本身就是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慰安妇”的话题是被附着在战争、妇女、性暴力、民族、国家等语境中的。同时，它不但是一个经典的历史命题，还具有极强的现代意义。追古溯今，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在一个处于强势的民族对另一个相对弱势民族进行的攻击或侵略行动中，总是伴随着对这个民族妇女的身体进行性侵犯，并以性侵犯来加强这一受害民族的耻辱感。妇女似乎已经顺理成章地成了民族之间的战争或冲突中性暴力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即便是 21 世纪的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发生民族冲突或武力纷争的时候，对妇女的暴力依然没能避免。因此，“慰安妇”问题在当今也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那么，在东亚国际关系框架中如何解决已经渗透了民族、国家概念的“慰安妇”问题？性别视角的介入能否使“慰安妇”问题超越民族、国家的概念？

笔者认为：在过去的战争中女性被编织在民族、国家的概念之下，民族问题在阶级、性别等问题中成为首要问题。但今天在全球化这样一个背景下，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往有了多种渠道，不同民族、不同国家

^① 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第 17 页。

的人之间，可以跨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在某种观念和思想倾向上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性别似乎比较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概念，而在东亚获得一种认同。另外，性别理论和视角对历史的介入提升了性别问题，使它可以与民族、国家问题平起平坐，同时，也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女性学研究者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审视历史带来了极大的可能性。事实上，世界妇女大会、东亚妇女论坛等世界性和区域性妇女会议的召开，已经把东亚妇女、妇女组织在性别的旗帜下聚拢在了一起。“慰安妇”问题已经被纳入到了东亚妇女问题之中，或者说“慰安妇”问题已经将这些亚洲国家的妇女问题一并席卷了进来。

从1991年至今，围绕“慰安妇”问题的种种事件表明这一问题客观上将日本与韩国、中国以及其他曾经遭受磨难的亚洲近邻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日本的女性学学者站在性别视角对“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研究和认知已经跨越了国家主义的藩篱，与被侵略国家的妇女形成了共鸣。同时，它带来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订正被篡改的历史，重新书写历史的真实，并共同拓展亚洲妇女问题研究的空间。

（责任编辑：洪 鸿）

る。鉄道投融资体制の特徴について分析し、投融资制度の転換過程における政策的動向について考察すると同時に、財政面での保障、開発モデルと投融资体制、受益者負担制度などの側面から、日本の経験及びその中国への適用性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日本文化の発生的特徴

潘暢和

日本の文化は互いに分断され、閉鎖された狭い地域で生成したものである。多くの分断された閉鎖的な生存空間がつながることによって、一つの全体構造を構成しながら、互に対立しあい、排斥しあって、競争しあうような関係を形成し、互いに「境を画す」ような政治的論理を生成してきた。この論理は長い歴史的發展のプロセスにおいて、最終的には普遍的、恒常的価値判断の不在を導き出した。日本民族が「世界的公民」となっていく中で、その独特な民族的ロジックは世界から評定を受けることになろう。

ジェンダーの視点から見る「従軍慰安婦問題」

胡 澎

「従軍慰安婦」問題は、実質的には侵略された国々の女性に対する旧日本軍の集団的暴行であり、「反人類」的犯罪行為である。「従軍慰安婦」の問題をめぐって、これまで歴史・政治・国際関係論及び国際法などの視点から、さまざまな研究がなされてきたが、近年「ジェンダー」の視点からの研究が、従来の研究とは異なる重要な新しいアプローチとして進められている。1990年代以来、東アジア諸国の女性研究者や女性市民運動家及び民間女性団体が、国境を越えて、元「従軍慰安婦」の生存者に対して行ったインタビューや女性主導の「女性国際戦犯法廷」により、「慰安婦」問題はジェンダーの意味において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壁を乗り越えて、東アジアと世界的問題として注目されるに至った。本稿もジェンダーの視点から「慰安婦」問題へのアプローチを試みるものである。